

1

华西教会新闻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899-1943

(英)陶维新夫人 (Mrs. R. J. Davidson) 等 主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华西教会新闻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899-1943

(英)陶维新夫人 (Mrs. R. J. Davidson) 等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899—1943)(全三十二册) / (英)陶维新夫人(Mrs. R. J. Davidson)等主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13 - 5068 - 1

I. ①华… II. ①陶… III. ①教会—重庆市—1899~1943—期刊—英文 IV. ①B979.2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9212号

责任编辑:许海燕

ISBN 978-7-5013-5068-1



书名 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899—1943)(全三十二册)

著者 (英)陶维新夫人(Mrs. R. J. Davidson)等 主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00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5068 - 1

定价 18000.00元

珍贵的文献 研究的宝库：

《华西教会新闻》概述

龙 伟

《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作为西南地区最早以英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份刊物发行量较小,在国内收藏甚少。该刊的稀缺及不广的收藏,使得学术界对刊物的研究相对有限,一些既有的只言片语的论述往往也多有讹误。所幸近些年来,随着史料的发现及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学术界也越来越注意到这份刊物不同凡响的价值。为使读者对《华西教会新闻》有基本的了解,兹对该刊作扼要的介绍。

为论述的方便,有必要先对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的名称作简单的说明。该刊是一份英文刊物,在刊物的封面上,创刊号作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但在 1899 年 1 月 23 日,华西差会顾问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的定名是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笔者所见最早的一份纸本,1900 年出版的第 2 卷第 7 期,封面已改作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此后直至终刊,该名称一直未有任何变化,名称的始终如一反映出这份刊物办刊宗旨较为明确一致,刊物的编辑出版过程相对是较为稳定的。对于这份刊物的中文名称,学界有不同的称法,概而言之,主要有《华西教会新闻》《华西传教新闻》《华西教会月报》等不同的说法。这份刊物因以英文出版,主要又是办给传教士看的,故而刊物本身并没有对应的中文名称,上述几种称呼都是研究者为研究、论述的方便,直接从英文名称翻译过来的,可以说都是可行的。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华西教会新闻》这一称法最为普遍。本文在叙述时,亦采用此说,特此说明。

一、《华西教会新闻》出版概况

《华西教会新闻》于1899年2月在重庆创刊出版,第一任主编是陶维新夫人(Mrs. R. J. Davidson)。该刊是基督新教在西南地区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也是近代以来在四川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刊物。《华西教会新闻》共出版45年,于1943年底停刊,是基督教在四川创办的最重要、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刊物。就整个近代四川新闻出版史而言,该刊的出版年份亦属最长。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如火如荼,基督教亦追随其步伐广传福音。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基督教凭借不平等条约向内地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大量地涌入中国内地。新教传教士进入四川,始于1866年,该年伦敦会杨格菲(Griffith John)与英国圣书公会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游历四川。1877年,内地会的麦嘉底牧师(John McCarthy)在重庆建立了基督新教第一个福音传教点。此后的十余年间,各差会相继来川,各自建有自己的传教站。到19世纪末,基督教差会在西南地区已是“派系林立”,数量甚众。

基督教在华西的各差会为避免传教领域的重叠和传教力量的分散,乃决定联合布道、协作共进。1899年1月,基督教在华西的各差会在重庆召开首次宣教师大会,共有72位传教士与4位来访者与会。此次大会通过《睦谊协定》,对各差会的传教区域进行了明确划分,决定各差会在事业方面相互协作,并专门成立华西差会顾问部(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Advisory Board),负责协调各差会间的关系^①。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圣公会何诗白牧师(J. H. Horsburgh)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圣公会如何利用通函(circular letter)加强圣公会内部传教士之间的联系,这给与会传教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与会传教士迫切感到华西的各差会也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媒介来协调各差会之间的关系以增强合作^②。大会讨论并决定为传教士们出版一份新闻通讯类的杂志,陶维新夫人被指定负责这份杂志的编

① 此次会议在华西基督传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因此会议,差会间分散无序的传教状态得以调整,达成了差会间相互协作的共识,各差会间“合作高于冲突”的原则由此确立。相关的介绍可参见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史》,巴蜀书社,1992年。

②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8, No. 2, p. 7.

辑和发行^①。大会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像圣公会那样通过传教士游历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因此决定寻找一个中心和负责人接收来自各个传教站的信息,再把收集的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最后以邮寄的方式分发出去^②。杂志的具体工作交由华西差会顾问部负责,杂志的名称和定价由华西差会顾问部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③。

1899年1月23日,华西差会顾问部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专门对刊物的出版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议定将这份刊物定名为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同时还规定刊物售价为每年0.5两白银^④。重庆被选定为杂志的出版中心,陶维新夫人被任命为主编。此外还任命了各地传教站的编辑和通信者,他们负责给《华西教会新闻》提供当地的“新闻”^⑤。1899年2月,《华西教会新闻》在重庆出版第1期。该期共16页,包括10页正文和6页增刊,为手写本。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和四川境内不断发生的教案,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很大危机,大批传教士被迫撤至东部沿海城市。1900年8月,《华西教会新闻》延期出版至第2卷第7期后,迁往上海,编务通讯地址暂设上海昆山路34a (34a Quinsan Road, Shanghai)^⑥。《华西教会新闻》在上海属临时出版,出版的具体期数不详。然而在1901年所出第3卷1、2期合刊封面上,已有“Published at Chungking-West China”字样,这表明在上海出版的时间不超过半年。在1901年年初,该刊已迁返重庆继续出版^⑦。《华西教会新闻》迁返重庆后,共在重庆出版6卷,卷期从第3卷至第8卷。1907年1月,《华西教会新闻》由重庆迁至成都出版,卷期续前,为第9卷第1期。此后直至停刊的37年间,该刊一直在成都出版,未有任何迁转。

《华西教会新闻》早期的印刷情况不甚清楚,唯知最早的几期系手写本。然据1900年第2卷第7期来看,此时已改为16开铅印,可见初期手写草创的困难局面

①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8, No. 2, p. 7.

②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17, No. 6, p. 5.

③ “The First Editorial-February 1899”,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9, No. 2, p. 39.

④ “Echoes from the West China Conference”,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5, No. 2, p.

7.

⑤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17, No. 6, p. 6.

⑥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0, No. 7, p. 8.

⑦ Joseph Beech, “Report of publishing committee”,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1, No.

1-2, pp. 3-4.

并没有持续太久,教会方面对该刊的出版甚为重视。自1904年起,《华西教会新闻》由重庆的龙门浩书社(The Lung Men Hao Press)负责印刷。1905年,龙门浩书社与广益公司(音译,Kuang I Publishing Co.)合并为华英出版公司(The Chinese & English Publishing Co.)。从是年6月起,《华西教会新闻》也改由华英出版公司负责印刷。1907年1月,《华西教会新闻》从重庆迁至成都出版,此后一直交由基督教在西部地区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华英书局(The Canadian Mission Press)承印^①。

《华西教会新闻》是针对传教士而办的,并没有打算面向中国的阅读人群,因此它的发行量并不高。刊物最高发行量在450册左右,通常多维持在400册左右。1903年,杂志发行量为222册,1904年为230册^②。1914年,《华西教会新闻》的发行量达到400册,不过,这一数量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仍不见增长,每月的出版量仍基本保持在450册以内。在读者的分布方面,海外和国内的读者数量大体各占一半。以1937年为例,确切的订购人数是424人,中国各地订户为195,占总订购人数的46%,美国、英国、加拿大与澳洲等地的订户为229份,占总订购人数的54%^③。考虑到在川各差会及下属各主要传教站都会订阅,因此,国内的销售份额几乎全由传教士占据。

“二战”爆发后,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大化,中国与海外的沟通日渐困难,传教士所需的图书与文化用品无法从海外输入,在华传教士与国外教会的联系被切断,《华西教会新闻》损失了为数众多的海外订购者,国外捐赠也因此中断,经营状况备受影响。在此情况下,《华西教会新闻》仍坚持出版,在加强各教会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信息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日益恶化,各教会的经济状况也渐入窘境,《华西教会新闻》最终无力承担印刷与纸张的巨额费用,被迫于1943年年底停刊。在最后一期上,编辑部这样写道:“曾经打算本年出版3期,但事实证明这已不可能。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带着深深的遗憾决定:在财政状况好转或者得到专项补助前,当前除了暂停出版外已经别无他选。因此,本期将是无确定时期的最后一期。”^④

① “To sub-editors and subscriber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 No. 12, p. 291.

② “To subscribers and friend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4, No. 12, p.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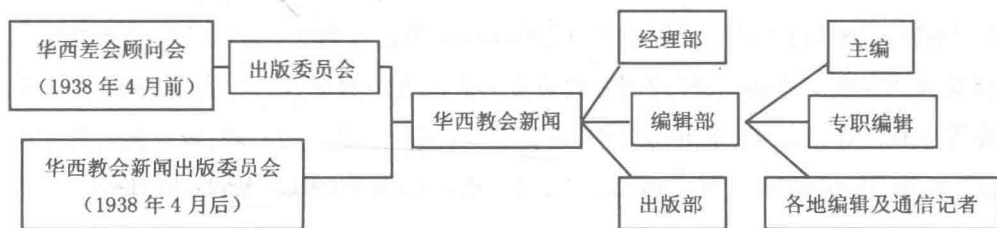
③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7, No. 2, p. 37.

④ “Decision to Suspend Publication Pro Tem”,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43, No. 5 - 12, p. 56.

二、《华西教会新闻》的组织系统与经营管理

《华西教会新闻》最初由华西差会顾问部负责,后来华西差会顾问部下设出版委员会,改由出版委员会具体负责《华西教会新闻》的出版工作。《华西差会顾问部细则》规定出版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两人应该分别是杂志的主编和经理。委员会负责所有与《华西教会新闻》相关的出版事宜,重大事宜则与华西差会顾问部下设的当地分部(共设成都、重庆、云南、贵州四个分部)协商决定^①。1937年9月24日,华西差会顾问部执行委员会决定终止差会顾问部的运作,由各差会各任命一名代表组成新的《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Publication Committee)负责《华西教会新闻》的出版工作^②。就《华西教会新闻》来看,该刊1938年3月号封面仍写明由差会顾问部负责出版,是年第4期起则改由《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出版。由此至停刊,该刊的出版工作一直由出版委员会负责。

《华西教会新闻》组织系统图



1901年1月8日,华西差会顾问部出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华西教会新闻》的具体工作分为出版、管理与编辑三个部门,以减轻编辑的负担,让他们能各司其职、办好刊物。出版委员会议定,由陶维持先生(Mr. A. Warburton Davidson)负责出版工作,希斯洛普(Mr. Hyslop)负责商业管理,陶维新夫人除继

^① “Constitution and by-law of The West China Mission Advisory Board”,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16, No. 3, p. 27.

^② “West China Missionary Advisory Board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7, No. 12, p. 16.

续担任主编外,还要招揽各地编辑(sub-editors),负责编辑部总体工作^①。随着《华西教会新闻》出版步入正轨,刊物的内容愈为丰富,文章品质和数量都有明显的提升,这对刊物的编辑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1909年5月,因编辑部工作需要,编辑部添设了教育、文学、新闻、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五个专职编辑。第一届专职编辑分别为新闻编辑倪维新(J. Neave)、教育编辑客士伦(C. R. Carscallen)、文学编辑斐焕章(J. Vale)、青年工作编辑唐彼美(C. E. Tompkins)和妇女工作编辑惠爱真(Miss. G. E. Wells)^②。

尽管杂志添设了五位专职编辑,但专职编辑并不能代替撰稿作者成为杂志的信息来源。《华西教会新闻》的时事消息大部分都依赖该杂志在各传教站的编辑(sub-editor)和通讯记者(correspondent)采写。杂志委任了各传教站(station)的传教士担任外地编辑和通讯记者。1901年第7、8期合刊上,编辑部即公布了各地的编辑共19人^③。1906年9月,《华西教会新闻》公布的各地编辑名单共有26人,遍及华西26个传教点,其中24人都在四川。编辑人数以内地会为最多,共14人^④。

《华西教会新闻》作为教会内部的英文刊物,主编和经理等重要职务都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只有杨少荃等少数中国基督徒参与了编辑。从1899年2月第1号出版至1943年年底停刊,先后有10人担任《华西教会新闻》主编,其中周忠信(Dr. J. Taylor)担任过4次,杜焕然(J. L. Stewart)担任过两次。主编主要负责文字编撰及其他各项交流活动,经理则主要负责杂志的经济收支、征订、资金捐赠、广告刊发等事宜。在杂志45年的历史中,共有15人担任过杂志的经理,较突出的有海国禄(A. H. Broomhall)、傅文博(G. M. Frank)、孙秀英(Miss Adelaide Harrison)等人,其详细情况如下表:

① Joseph Beech, "Report of publishing committee",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1, No. 1 - 2, pp. 3 - 4.

② "Minutes of West China Missions Advisory Board",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9, No. 6, p. 3.

③ "Sub-editor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1, No. 7 - 8, inner front cover.

④ "To sub-editor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 No. 9, pp. 208 - 210.

《华西教会新闻》历任主编、经理(1899—1943)

主 编		经 理	
姓 名	任职时间	姓 名	任职时间
Mrs. R. J. Davidson(陶维新夫人)	1899.2—1902.7 ^①	Hyslop(希斯洛普)	1901.1—1902.12
Mrs. John Parker(巴约翰夫人)	1902.8—1906.12	A. H. Broomhall(海国禄)	1903.1—1906.12
O. L. Kilborn(启尔德)	1907.1—1909.4	G. M. Frank(傅文博)	1907.1—1909.12
Henry Hodgkin(霍德进)	1909.5—1910.1 ^②	A. T. Crutcher(陈文增)	1909.6—1916.2
Dr. J. Taylor(周忠信)	1910.2—1911.12	Mr. Homer G. Brown(饶和美)	1916.3—1914.4
J. L. Stewart(杜焕然)	1912.1—1916.12	W. N. Ferguson(福格森)	1917.5—1918.5
Dr. J. Taylor(周忠信)	1917.1—1921.12	空缺	1918.6—1918.12
J. L. Stewart(杜焕然)	1922.1—1924.12	G. M. Frank(傅文博)	1919.1—1921.12
Dr. J. Taylor(周忠信)	1925.1—1928.12	G. Vinden(云登)	1922.1—1922.12
Dr. Lewis F. Havermale(何体道)	1929.1—1930.12	S. H. Frier(福赉尔)	1923.1—1925.1
Mr. F. Boreham(罗四维)	1931.1—1934.1	G. M. Frank(傅文博)	1925.2—1927.8
Dr. J. Taylor(周忠信)	1934.2—1936.4	H. J. Opershaw(夏时雨)代理	1927.9—1928.5
Mr. Homer G. Brown(饶和美)	1936.5—1939.12	G. M. Frank(傅文博)	1928.6—1933.1
Mr. Lutley(陆义全)	1940.1—1943.12	Miss Adelaide Harrison(孙秀英)	1933.2—1937.4
		Mrs. E. C. Lechler(陆义全夫人)	1937.5—1938.4
		Mrs. B. Burgoyne Chapman (贾溥萌夫人)	1938.5—1938.6
		空缺	1938.7—1938.10
		Jane Hibbard(希巴德)	1938.11—1939.10
		Argetsinger, Miss Minnie E.(明德馨)	1939.11—1943.12

《华西教会新闻》从创办之初就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刊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杂志的订购费用。《华西教会新闻》的发行量不大,刊物订户长期稳定在400册左右。这大约400册的订购费用是《华西教会新闻》资金最重要的来源。第二,广告收入。广告收入构成《华西教会新闻》另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

① 1901年3月,毕启(J. Beech)在上海担任过临时主编。

② 霍德进虽被选为主编,但要到1910年1月才能加入工作。因此1909年5月至12月主编空缺。启尔德离任前已经编好5月刊。1910年1月,霍德进担任主编,2月即卸任,可谓该刊历史上实际任职最短的正式主编。

以抗战前的1936年为例,杂志全年收入为1060.73 鹰元,其中杂志订购费用为699.13 鹰元,广告收入为260.50 鹰元。两项收益约占全年总收入的90.5%,成为《华西教会新闻》主要的经济来源^①。此外,教会捐助也是《华西教会新闻》收入的一个来源。《华西教会新闻》不时得到部分传教士个人及教会团体的捐赠。在困难时期,编辑经常发出请求捐助的呼吁。不过,这样的捐助数量相对有限,并无法从根本上保障杂志的常规运作。总的来看,《华西教会新闻》经济状况并不富裕,资金来源也相对有限,杂志甚至还要寄希望于个人或团体的无偿捐助以协助出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西教会新闻》未来的命运。

抗战爆发后,中国经济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印刷、纸张、工作人员的费用日益攀高。1937年2月期的《华西教会新闻》,共40页,印刷出版费用为71.80元。1941年2月出刊的1、2期合刊,共52页,印刷出版费用高达452元。再到1941年10月出刊的9、10期合刊,共54页,费用又增长一倍多,达992元^②。1941年3月24日到3月26日,仅仅在三天之内,成都生活费用的平均指数就从1012元增至1449元^③。《华西教会新闻》面对如此规模的通货膨胀,显得办法不多,力量不足。尽管编辑部一再坚持出版,但最终不得不于1943年年底停刊。

三、《华西教会新闻》的办刊宗旨与风格

华西基督教差会创办《华西教会新闻》的主要目的是为交流信息和加强合作,这决定了《华西教会新闻》自其筹备之日起就是一份“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传教士圈内的刊物。杂志创办初始,编辑们就选择了基督教教父圣·奥古斯丁的箴言“基于要事,统一;基于非要事,自由;基于所有事,仁爱”,作为杂志的基本原则^④。

1899年2月,《华西教会新闻》创刊号的社论表述了其最初的宗旨:“要是没有各地助理编辑们系统的和积极的说明,我们的刊物将会失败,因为它是为了‘来自华西所有差会的信息的流通’——而在有效的相互协作下,将会出现最愉快的工作

①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7, No. 3, p. 30.

② “Important Notice”,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41, No. 11 - 12, p. 355.

③ “Cost of Living in Chengtu”,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41, No. 5 - 6, p. 196.

④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17, No. 6, p. 6.

前景: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差会的所有同工互惠的‘紧密团结’,以增加富有同情的理解和‘领悟性’的祈祷。当我们发布新闻报导的时候,我们是在写信给‘弟兄们’、‘肢体’、‘同工’;当我们阅读它们的时候,我们要培养共同的理念并祈祷避免批评的或评判的精神。”^①首任主编陶维新夫人指出:“《华西教会新闻》是华西三省传教士的声音,只有依靠大家共同维持才能成功。呼吁地方编辑、普通读者就任何有用的或对传教士来说有趣的文章投稿,才能使《新闻》成为传教士进步的真正记录、思想交流的管道。”^②第三任主编启尔德则说:“为什么要等到八到十年召开一次的传教大会才来交流思想和经验呢?唾手可得的《华西教会新闻》就是我们的平台。”^③《华西教会新闻》早期所有的言论都表明,杂志出版的目的在于为华西地区传教士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促使华西各差会的紧密协作。1905年,在致全体订阅者的信中,《华西教会新闻》更是明确阐明杂志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华西传教士爱与同情的紧密结合,从而让传教士们感到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或松散的小团体,而是为“中华归主”而奋斗的统一体^④。

创刊伊始,《华西教会新闻》秉持的办刊宗旨就相当明确,在该刊出版的45年历史中,该刊的办刊宗旨虽偶有调整,但其基调却一以贯之,基本上没有变化。启尔德总结刊物“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特点可谓贯穿始终。这一点从作者群体及讨论主题上也可以清楚看到。作为华西基督教差会的“喉舌”,加之又是一份纯英文出版物,刊物文章大多出于西人手笔,华人文字寥如晨星^⑤。早期的杂志中,仅刊载过一位陈姓中国人(Ch'en Chang-sin)的通信,那还是因为该期出版时传教士大部分都从四川撤离,杂志为了解内地情况计的无奈之举^⑥。有学者作过统计,《华西教会新闻》出版的45年中,共有约90位中国人士在刊物中发表各类地方消息、通知、报告、诗歌、散文、专论等文章约140余篇。在1919年前,华人发表的文字不超过20篇,1920年代之后,华人撰写的文章才逐步

① “Editorial”,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No. 1, 1899, p. 2.

② “Editorial”,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1, No. 7-8, p. 61.

③ “Editorial”,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7, No. 1, pp. 1-2.

④ “To subscribers and friend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5, No. 12, p. 256.

⑤ 《华西教会新闻》完全由外国人负责经营管理,主编和经理等重要职务都由外国传教士担任。作为中国基督徒,笔者只见到杨少荃参与了刊物编辑。

⑥ Ch'en Chang-si, “Kuan Hsien Note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1, No. 1-2, p. 25.

增加。这些中国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会领袖,他们受过相当的教育、具有丰富的基督教工作经验,关键是能用英文写作。一些较有名望的教会领袖如吴耀宗、刘廷芳、张伯怀、韦卓民、赵紫宸、张雪岩、孙恩三、刘龄九、沈子高、张凌高、方叔轩、顾子仁、蔡咏春、杨少荃、王俊贤、费宗之等曾在刊物发表文章。尽管华人在刊物上有所发声,然而较之《华西教会新闻》刊载的全部文章而言,华人作者的声音无疑极为微弱,刊物仍旧把持在传教士手中。而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华人作者,文章讨论的议题显然都是以“传教”为中心展开的。

《华西教会新闻》长期秉持的以“传教士”为核心的办刊宗旨虽然有利于刊物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刊物变得相对封闭而保守。这在1930年代初的刊物上表现得极为明显。1929年1月,何体道担任《华西教会新闻》主编,他上任后试图对刊物的办刊方针做出大胆改革。他在担任主编后发行的第2期《华西教会新闻》中,即1929年的2月刊中,第一次以刊物主编的身份在社论中明确地宣告了他带领下《华西教会新闻》的组稿方针:“我们的政策是为对宣教工作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有可能通过阅读了解任何一位——无论中外,激进或保守——撰稿者的观点。”^①何体道的意图是使刊物变得更开放,然而他的作法挑战了刊物的原有宗旨,因而遭到了部分传教士的强烈质疑。有的传教士对刊物邀请中国作者撰稿的思路提出质疑,他们声称既然刊物的名称为“传教士”(missionary),那就是为传教士团体而办的刊物,中国人无权对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传教成效指手划脚^②。尽管何体道随后对这种论调进行了驳斥,并坚持相对开放的办刊理念,鼓励刊登不同意见、不同来源的稿件,然而不难看到《华西教会新闻》从创办伊始即坚持的办刊宗旨将刊物局限在了“传教士”的小圈子里,哪怕是偶尔、局部的变化都可能遭遇巨大阻力,以致刊物的性质、风格、特点长期沿续,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随着近代中国时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基督教徒的日益增多,《华西教会新闻》是继续代表传教士、停留在封闭的小圈子,还是代表整个华西教区,正视中国基督徒的成长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37年9月24日,华西差会顾问部执行委员会决定终止差会顾问部的运作,改由各差会各任命一名代表组成新的《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1938年3月21日,在新的出版委员会举行

① L. F. Havermale, "Editorial",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9, No. 2, p. 7.

② L. F. Havermale, "Editorial",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9, No. 4, p. 2.

的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就提出杂志风格应该更加中国化,希望得到中国基督徒的合作,使刊物能够代表整个教会而非只是传教士团体^①。《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的这种意图反映出《华西教会新闻》对传统的“为了华西传教士,由华西传教士所办”的这一既定办刊宗旨的反思,透露出杂志企望朝向“为华西教会”的转变。同年11月,新闻出版委员会再度召开会议,委员会提出建议将杂志刊名改为《华西基督教新闻》(*The West China Christian News*),虽是从 Missionary 到 Christian 的一词之易,却反映了委员会希望刊物能涵盖更为宽泛的内容,代表整个华西基督教而非仅是传教士小团体^②。上述的意见都显示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华西教会新闻》不应故步自封,仅仅作传教士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而应该肩负起整个华西基督教会沟通、交流的重任,这就要求《华西教会新闻》从传统专为“传教士”服务转向为包括中国信徒在内的整个华西基督教会服务。尽管杂志的管理机构已注意到杂志有变革的必要,不过就实际来看,杂志名称最后还是没有改变。在刊物的最后几年,杂志虽努力更为开放,也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但由于语言的障碍,杂志的读者群体始终还是曲高和寡的“小众”,而不可能真正面向中国“大众”。

纵观刊物45年的创办历程,《华西教会新闻》“互通生气、加强协作”的办刊宗旨及“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办刊特点未曾出现过明显的变化,这虽然有利于杂志内容与风格的稳定、连续,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局限了杂志的发展,导致了杂志长期封闭在传教士的小圈子之中,未对其时的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四、《华西教会新闻》的编排设置与内容

《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历史较长,出版期数众多,为更好地展现杂志的编排设置与主要内容,下面以1899年2月创刊号及其后每十年第1期(1909年第1期、1919年第1期、1929年第1期、1939年第1期)为样本,对各期刊载的具体内容略加介绍,以望能管中窥豹,让读者对该刊的基本样态及主要内容有大致地了解。

^① “The News Publication Committee”,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8, No. 4, p. 136.

^② J. Hibbard,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Report”,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8, No. 12, p. 429.

1899年2月出版的创刊号登载的内容有:社论,华西传教士大会报告,华西顾问部记录,外国儿童学校(消息),重庆新闻。在正刊之后,还附有一个长达6页的增刊,记载了首届华西传教士大会对传教领域的划分与协作的决议。

1909年第1期的内容包括:类似社论的编者前言,加拿大信徒传教运动,美以美教区会议,华西圣教书局月会,诗歌、箴言:“文”的国度,展望与回顾,邮政式罗马拼音法,昭通传教站新闻,成都传教站新闻,摘要,协合中学工作,要闻节选,出生启事。

1919年第1期刊载文章包括:社论,华西圣教书局,华西圣教书局的组织结构,早期的小册子发行,书册发行成果,“在水边播种”,医院布道的小册子,布道与小册子,书局将来的展望,成都会议对华西圣教书局的意义,至理名言,布道消息,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荣县的妇女布道工作,富顺的妇女布道工作,重庆消息,感恩节,医务人员的请求,为公众利益,通信,建筑消息,医学论文,流感的疗法,出生启事。

1929年第1期内容如下:社论,巨人的工作,我的杯子:你能喝吗?川东之行,华西差会顾问部,何谓进步?附注,重庆新闻,出生启事,华西边疆研究会计划,罗泉井教会:困难时期的发展。

1939年第1期文章目次如下:马德拉斯来电,一条教义,信仰宣言,进入新的一年,诗歌:生命的长河,布道试验,侯礼敦主教,杨少荃,成都的工厂,满足需要?一封来信,义务祷告,昆明成为“难民城”,重庆新闻,“但这就是永生”,书会新成员,大学博物馆,黑门,下江新闻,华西教会新闻,上海给马德拉斯的建议,成都市区新闻。

从编排设置上看,《华西教会新闻》各期并没有明确固定的栏目划分,但每期杂志在编排上的大致分类还是有迹可寻的。例如创刊号有的“社论”和“新闻”,在其后的每一期基本上都会出现,成为相对固定的栏目。从整个编辑的体例来看,杂志基本上遵循社论、纪要、专文、各地新闻、通信、杂录(分类名称为笔者所加)这样的大致体例进行编排,这让杂志显得较为规范、连续。笔者根据对该刊的阅读,对杂志刊载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介绍于下:

社论:主要是杂志编辑部对差会、杂志及其他重要的事件所作评论、发表意见,或对该期杂志涉及的重要文章加以介绍。该栏目是杂志较常规的栏目,杂志通常会以“社论”为名编排一组文章作为开篇。

纪要:主要刊载华西差会顾问部、华西基督教各差会、各基督教团体的各类会议、报告、会议纪要、参会印象、会议评论等。此类文章如华西传教士大会报告、华西顾问部记录、中华圣公会新闻、云南的加拿大卫理公会、成都会议的印象、会议详情等。

专文:传教士对各类问题的分析、评论、研究。如发生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惨剧、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万县方言、泸州的洪灾、早期的中国传教事业、成都的社会环境和工业环境、西藏的疾病和死亡风俗等文章都属此类。

各地新闻:杂志基本上每期都会以一定的篇幅刊载来自各地的新闻,这些消息按地点排列为一组文章,基本都被安排在专论文章之后、读者通信之前。例如第19卷第7期的News Notes就刊载有来自西藏、叙府(今四川宜宾)、重庆、铜梁等地的消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刊载的新闻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万县等大中城市,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张,各县镇的消息也有所报道。

通信:该类信息通常被编排在各地新闻之后,旨在让读者透过信件了解各地情况、交流思想。与各地新闻相较,该类报告主要以“通信”的形式出现,内容不仅有各地见闻,还包括传教士对杂志办理、传教方针、时事问题等的交流和讨论。

杂录:主要是传教士个人的一些启事、通告等,包括出生启事、讣告、婚礼、休假等信息,通常安排在杂志的最末。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仅仅是笔者对杂志刊载内容进行的大致划分,事实上,每期杂志并不严格按这种分类编辑,即使一些常规设置的栏目,也并非每期固定不变。例如最后一期就没有社论。但若将几十年的杂志作纵向比对,则不难发现,上述分类与杂志内在的编排逻辑基本上还是吻合的。

再从杂志刊登的内容上看,作为基督教华西顾问部的机关刊物,《华西教会新闻》刊载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基督教在华西各差会的传教信息。《华西教会新闻》是基督教在华西各差会为协调传教力量、加强事业协作而创办的沟通与交流平台,这决定了杂志是华西基督教各差会共同的财产。“差会联合创办”的特点使得《华西教会新闻》能以较平等、包容的态度代表各不同差传团体的利益。《华西教会新闻》对华西地区各差会的会议、计划、安排、事业都有报道,堪称是华西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全书”。刊物内容既包括华西各差会传教布道的会议、决策、方案、报告,又包括各传教团体及传教士在华西兴办教育、设立医院、推进宗教文字出版、从事

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与详细活动,完全体现出“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特征。例如创刊号所载华西传教士大会报告、华西顾问部记录,1909年第1期所载美以美教区会议、华西圣教书局月会,1919年第1期关于华西圣教书局的系列文章都属于此类。这些与传教活动直接相关的文章在刊物上比例最大,构成了杂志的主体,这也决定了《华西教会新闻》是一份地道的宗教刊物。

除上述与传教活动密切相关的文章外,《华西教会新闻》也有部分文章涉及西部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及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在整个杂志中所占比例虽然不高,但总数不少。仅以1916年的杂志为例,涉及四川地区的社会风俗、人文地理的文章大致就有《成都的社会环境和工业环境》(18卷2期)、《四川的桐油树》(18卷2期)、《成都城墙的历史》(18卷9期)、《四川的史前石器》(18卷9期)等篇。此外,杂志还刊载了一些传教士对西藏、贵州和云南等地的考察报告。1901年的第1、2期合刊中就刊载有名为《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一文,对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11年1月,内地会茂尔夫妇(John R. Muir)在其《漫游西藏边境》的文章中则对该地区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地理测量。斐焕章对“占卜、算命和巫术”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加拿大传教士穆里儒(W. J. Mortimore)讨论了《中国的丧葬风俗》(17卷4期)。类似的文章还有《苗族的季会》(19卷1期)、《川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人民》(19卷2期)、《中国西部的风土人情》(19卷5、7期)等等。有学者进行过初步的统计,《华西教会新闻》所刊论述西藏的文章不下40篇,内容涉及西藏政治、地理、宗教、民俗、妇女、建筑、疾病、藏文献、差传工作等诸多方面,当属新教传教士对西藏较早期的初步认识,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五、《华西教会新闻》的价值

《华西教会新闻》作为近代四川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记录了近代以来传教士在华西地区活动的基本轨迹,也较完整地保存了西方传教士对西南地区的观察和认识,其价值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以笔者陋见,《华西教会新闻》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华西教会新闻》是研究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传播史、研究近代西南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载体。